

郭德宏 宋淑玉 张芝 / 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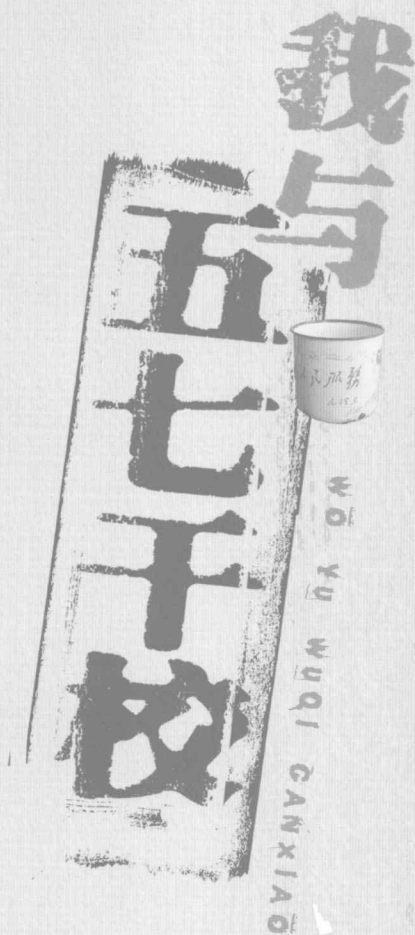
我与

五七干校

WU YU WU QI GAN XIAO

人民出版社

郭德宏 宋淑玉 张艺 / 编



责任编辑:王世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与“五七干校”/郭德宏,宋淑玉,张艺 编. 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9.4
ISBN 978-7-01-007744-4

I. 我… II. ①郭…②宋…③张… III. 五七干校-史料 IV. D6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5220 号

我与“五七干校”

WO YU WUQIGANXIAO

郭德宏 宋淑玉 张艺 编

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7.75
字数:265 千字 印数:0,001-8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07744-4 定价:3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目 录

蹉跎岁月

“五七干校”是“文革”时期根据毛泽东的《五七指示》兴办的农场，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、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，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、思想教育的地方。

在这里，无论资历深浅、品级大小，所有人都叫“五七战士”。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、大大小小的“走资派”、科技人员、大专院校教师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……许多科技工作者、文学艺术工作者，在“五七干校”那种条件下，也只能干体力活，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，他们的大好年华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了。

1. 在江西“五七干校”的日子/萧 克 (3)
2. 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/萧 乾 (17)
3. 回眸“向阳湖”/杨子敏 (23)
4. 文化部“五七干校”散记/张士安 (38)
5. 东岳“五七干校”/许志英 (49)
6. “五七干校”祭/季 音 (56)
7. “缴枪”/韦贤彰 (65)
8. “静海”作笔名/邵牧君 (68)

9. “张专家”来了/张一沛 (73)
10. 大沙河岁月/郭 敏 (79)
11. 大自然的孩子/张 耘 (85)
12. 都是海河人物/刘 耕 (89)
13. 独立的人格/周 明 (94)

“五七道路”

“五七干校”具有“改造”和“锻炼”干部两种功能，然而，繁重的体力劳动、单调的文化生活以及较差的生活环境，使不少到“五七干校”劳动的人处在艰难困苦之中。

他们被不分年龄、性别，统统按照军队编制，编到划定的连、排、班去，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。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：种田、挑粪、养猪、做饭、挑水、打井、盖房……要求自食其力。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，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。

14. 忆柳河“五七干校”/战凤翰 (103)
15. “干校”劳动的回忆/韦君宜 (129)
16. 荒废与荒诞/雷 达 (132)
17. 惠州市“五七干校”/丘其文 (137)
18. 进“五七干校”也是“福”/段义海 (144)
19. 老知识分子二三事/刘东升 (150)
20. 临沧专区孟定“五七干校”亲历记/袁学昌 (156)
21. 漫漫“五七”路/马 元 (162)
22. 实话实说话“干校”/郝孚逸 (172)
23. 田园里的故事/陶 阳 (179)
24. 土茯苓与红烧肉/贺心颖 (185)

追忆往事

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，“五七干校”逐渐冷清下来：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，部分农田也荒芜了；农业机械闲置在那里生满了铁锈；牲畜也没有人喂了，有的干校干脆把牲畜大批杀掉吃肉……

1979年2月17日，国务院发出了《关于停办“五七干校”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从此，“五七干校”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。冷清下来的“五七干校”最终被新恢复的党校所取代。

25. 往事追忆：“五七干校”/陈向阳（193）
26.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“五七干校”/李晓祥（206）
27. 我在“五七干校”的见闻/鲁大良（210）
28. 我走过的“五七道路”/王蕴玉（221）
29. “五七干校”见闻/李滨声（229）
30. 向阳日记（节选）/张光年（233）
31. 镇康“五七干校”回顾/杨德富（240）
32. 我走向社会的第一驿站：“五七干校”/王国庆（244）
33. 中宣部“五七干校”纪事/吉伟青（248）
34. 中央在湖北沙洋“五七干校”的回顾/孙君恒（258）
35. 回忆在咸宁“五七干校”的日子/崔道怡（262）
- 后记/（276）

蹉跎岁月

“五七干校”是“文革”时期根据毛泽东的《五七指示》兴办的农场，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、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，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、思想教育的地方。

在这里，无论资历深浅、品级大小，所有人都叫“五七战士”。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、大大小小的“走资派”、科技人员、大专院校教师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……许多科技工作者、文学艺术工作者，在“五七干校”那种条件下，也只能干体力活，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，他们的大好年华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了。

1. 在江西“五七干校”的日子

萧 克

1969年11月下旬，组织上通知我，准备去江西“五七干校”接受再教育。所谓再教育，对我这个具体人是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。

当时，我的心情很矛盾。一方面，感到江西是造反派称霸的地方，远离中央，也远离家人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很难与同情我的人取得联系。另一方面，我又对江西有难以割舍的情感。我最早参加战争（北伐战争）是在江西；参加南昌起义在江西；井冈山时期跟着朱毛打游击主要在江西；湘赣时期我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区也在江西……可以说，在我此生的革命历程中，江西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。江西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都让我依恋；江西的父老乡亲，多少年来总萦绕在我的梦中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，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情。的确，我早就把江西看做是我的第二故乡了。

1969年12月初，我随一批老弱病残和少数因故滞留的家属，最后离京赴江西“五七干校”。此去吉凶难卜，真是“战地黄花衰，孟冬西风疾”啊！

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，除被褥和换洗的衣服外，就是一只大书箱，里边装满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30本书。还有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文、史、哲、经方面的书籍。当时我想，干校生活无非两条：除继续接受审查，参加劳动外，其余时间就是看书，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一点马列主义，弥补几十年来无暇系统学习理论的缺憾。

在赴江西永修的火车上，望着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色，我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逝去的往事，此刻又历历映现在眼前。抚今追昔，不觉

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，遂即兴默吟五古一首：

我自江西来，又回江西去。
昔日草鞋行，今朝飞车遽。
轻装怀马列，悠然赴“五·七”。
战地黄花衰，孟冬西风疾。
云山赋归欤，老骥今伏枥。

此诗当时不敢公开。我信仰马列主义 40 多年了，此时虽然处于“孟冬西风疾”的环境，但仍不失“老骥伏枥”之慨。

大约是 12 月上旬，我们来到了修水河畔的云山垦殖总场场部周田镇。这里离校部所在地新丰大队约 14 里路。我被编入离周田最近的 3 连。连部驻小里村。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和外单位来校的带小孩的女同志，被安排住在周田公路旁边小山包上废弃的云山总场职工医院旧址。

我一个人单独住在最东头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小屋里。旁边住着当时的人事宣教局局长张继璜、副局长李玉昌，计划局局长黄家景和另外几个机关干部及其家属。那时我 61 岁，是这个“北京新村”居民中最年长的一个，大家都叫我老萧或萧老头，孩子们叫我萧伯伯。

“文革”以来，我的心脏一直不好。出发前，周总理指示要给我带个炊事员。我由衷地感激总理的关怀，但谢绝带炊事员。我想，既然是重返江西，那就一切从头做起。尽管我已年过花甲，但我还是那个气概，不服气，不消极，更不悲观。

到干校后我坚持自己买菜、烧饭、砍柴，衣服破了，能补的自己缝补。有时柴米不继或不想动手，就到食堂去买饭买菜。粮食没有了，就跟邻居们一起到 4 里外的罗店去买米。饮食起居完全自理。“缺腿方桌倚陋室，锅碗瓢盆皆杂陈”，便是我在一首诗中概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自炊自饮的生活情况。其实，那个只有三条腿的四方桌上，何止摆锅碗瓢盆，读的书籍、写字用的纸张，也都堆放在上面。除了当饭桌，还要当书桌用。刚来时，闹了几天肚子，在邻居们的照料下，身体渐渐康复，生活也习惯

下来了。

赣北山区的冬天，潮湿阴冷，凉气常从墙缝、屋顶乘隙而入。室内无火取暖，我想起过去徐特立曾跟我说过，当年他在长沙教书时，冬季，室内寒冷，便在屋里就地跑步取暖，不失为驱寒之一道。于是，我也仿效徐老的“保暖术”，在房间里就地跑步，果然一会儿身上就有了暖意。

不知是哪位同志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，连部派人送来了一篓木炭。室内生起了火盆，顿时暖意融融，心情也随之豁然起来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尽管节省着用，40斤木炭很快还是烧光了。有时冻得不行，就躺在床上，盖起被子捂捂。我想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，总得想个门路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。

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前后、山包附近，有不少齐胸高的树桩，这是人们在伐木时站着拉锯留下的，有天在室内又感到冻得难受，便拿着斧、锯去伐树桩，把砍回的木桩劈成柴，这样既可以驱寒，又解决了烧饭、取暖的薪炭问题。

从北京出发时，我就作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。我想，将来不论到哪儿，总得学点劳动技能，以安身立命才是。到干校后，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，开始学木工手艺。先买来一套大、中、小号的木工工具，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，就试着当起“木匠”来。好在云山既是农区又是林区，食堂的薪柴堆里就可以挑选出有用之材，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材料。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、桌子、书架之类的家具，看起来还满像回事。

俗话说：“三分木工七分油”，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，油漆上得好，可为木工增光；油漆上得不好，木工的缺点全暴露出来。为此，我专门去向一位老木匠师傅请教。他告诉我：油漆之前，先要刮好腻子，把刨面抹平；上油漆的秘诀是“横刷竖顺”。我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，果然不错，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，没有气泡，像个“鲁班师傅”的作品。1972年回北京时，我把自己做的四方桌和长方形折叠桌也带了回来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除因北方房间里有暖气，使桌子稍有收缩和裂缝外，色泽仍然光亮。

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，打心眼里感到喜悦和自豪，我跟邻居说：“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”大家只是夸我的手艺不错，却不好意思麻烦我。

我们这几户人家的到来，颇受小镇人们的关注。江西老表本来就热情好客，我们这些外来户每到饭堂吃饭、买东西，他们就主动上来搭话，大家很快便混熟了。

周围的群众，像售货员赵万贞、广播员陈步云、理发员小张夫妇以及他们的父亲——烧开水的老张等，见面时总要打打招呼，聊几句家常，关系相当融洽。有时他们也到我的住地来玩，谈谈镇上的情况。商店的日用品进货时，小赵就会来通知我去买。

我不抽烟，平时也很少喝酒，但对江西土产、度数不高的米酒却有兴趣。特别是冬天夜读时，喝上几口，祛风御寒，胃中很舒服。腊月将尽，有一天小赵跑来通知说来米酒了。我便和张继璜同去，两人抬回一坛，不光是备以自酌，也准备用来招待到周田办事的不速之客。

农历春节，是我国人民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。“文革”三年，尽管大破“四旧”，但这个传统却很难破。道理很简单，这是中国人千万年来的风俗，并非什么“旧”。邻居们盛情地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过年，而我总觉得自己仍在受审查，“戴罪之身”不宜给别人添麻烦，都婉言谢绝。

除夕之夜，山区小镇一片静谧。我独居斗室，展读灯下，四壁孑然，形影相吊。遥想全家5口分散在北京、江西、湖南、河北等处，天各一方，不得团聚，心情不禁怆然。于是取酒自酌，聊以排遣对家人的思念。尽管这样，我仍坚信，我们的党、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社会主义总是有希望的，眼下种种不正常现象，迟早会改变。我有时就默诵白居易《凶宅》中的诗句：“权重难持久，位高势易穷……”，以表达对造反派前途的看法，也宽解当时窘迫的处境心态。

到干校后，不少搞专案的外调人员找我调查，问的多属历史情况。于是写检查、交代和写证明材料就成了我的主要工作。我始终抱定“实事求是”的宗旨，坚决不夤缘时会，以免害人害己，遗患无穷。比如在井冈山时，红军指战员一人一条扁担挑谷子的事，朱德挑了就是挑了，林彪

没挑就是没挑。当时，林彪说是身体不好，没去；这些都是事实，不容改变，更不能把“朱德的扁担”硬说是“林彪的扁担”，欺世盗名。伪造历史。

外调人员让我交代的历史材料涉及面很广，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都有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，便不得不认真地重温一遍历史，从而使脑海中早以淡化湮没了的人和事，又逐一生动地浮现在眼前。

我想起当年在江西扩兵的情景。那时，连队干部和战士都希望自己的部队满员，满员了，打仗和服勤务做群众工作的人多，就能打胜仗，多办事。所以每到一地尤其打了胜仗，抓到俘虏，官兵都愿意去做扩兵工作，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扩兵。每扩到一个兵，哪怕是“解放战士”（俘虏兵），大家都欢呼啊，我们队伍又增加新同志了！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。

忆昔抚今，不禁又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。从“文革”开始，我已“靠边”近5年。5年来，除了挨批斗、写检查，不允许干任何工作。当年，我们为了扩大革命力量，把能动员的人一个一个都动员进来了；而今天，我们这些老兵却一个一个地被赶出革命队伍，成了“革命对象”，纵有一腔热情，浑身力量，也只能空对青山嗟叹。

想到我已是61岁了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不久，就停止了党的生活，已5年了。我今生还有几个5年啊？不禁怆然。于是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倾吐心中郁结之言。写到激动处，两行老泪竟跌落纸上。

那个年代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写信，是很难送到毛主席手中的。我把信送交军代表，请他们转递，他们慷慨答应送北京。

在沉闷和孤寂中，我就读马列的著作。通读《列宁选集》时，特别喜欢第四卷中《十月革命四周年》这篇文章。它那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和勇于作自我批评的求实精神，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。

列宁在肯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，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，就是经济建设”，“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，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，犯的错误也最多”。而错误的原因，在于企图“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，在一个小农

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”。在他看来，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错误，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，使无产阶级国家“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”，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，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、依靠经济核算，努力提高生产，发展商品经济，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，把他们引导到更高阶段，“建立起牢固的桥梁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”。

对照列宁的话，我想起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情况。那时，我们不就是滥用行政命令，“刮共产风”、“吃大锅饭”；漠视农民个人的经营兴趣和对生产“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”；违背价值规律；忽视经济核算；有意无意地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，终于导致了3年经济困难（也有水灾的影响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更是片面强调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”，不重视经济建设；单一抓粮食生产，限制农民经营家庭副业，动辄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致使农村经济停滞不前，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。列宁把发展经济，当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，“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”的根本任务来抓；而“左”倾错误却把“突出政治”当做“一通百通”的灵丹妙药，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。

这些问题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虽然只能是掩卷深思、独自遐想，然而通过学习，思想上、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和慰藉，胸怀也随之而开阔。这时，我深深体会到“《列宁选集》一开卷，斗室油然起风云”了。斗室之中，风云一起，就产生当年在江西打游击那种气概了。在“五七干校”的两年多时间，我虽然处于受审的境地，但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，认真地读了些马列的书（内有普列汉诺夫《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》和由鲁迅翻译的《艺术论》等），这也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快事。

读书和劳动之余，我也不时到附近走走，了解一下当地农村生产和生活情况。云山，全称“云居山”，高达千米，峥嵘云上，巍峨挺拔，气象雄浑。在其东南的山腰上，有一个名为“横岭”的小村，地处偏僻，人烟稀少。村民利用大山斜面的小缓坡种些药材、蔬菜和少量粮食，生活虽

不富裕，但气氛安定祥和。我有时信步走到这里，深为其幽雅的景色和淳朴的民风所动，觉得颇似“文革”中的世外桃源。有感于此，即景赋七律一首：

幽居陋室望青天，暇日常思远市廛。
涉水登山行草径，穿林破雾见炊烟。
鸡鸣犬吠村邻睦，菜嫩花香空气鲜。
清酒相迎不速客，几疑身到武陵源。

古人虽云“诗言志”，然而我这首诗，却并不说明我愿意寄迹林泉。几年来的社会动乱搞得思想烦闷，心绪不宁，如今能有机会到这些地方走走看看，接触群众，感受一点真诚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自然状态，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，无疑也是山居生活的一件快事。不仅当时是如此，就是事后很久也很难忘怀。1987年我去云山，到周田后，要上山到云居寺看看。路经白石港，盘山而上。到云居山寺后，从原路而返，看到横岭，我问司机，汽车能否到横岭，他说，不，还有一里山路。我叫他在分路口停下，又叫他回周田。他说，在路口等您回来。我说，不要等。由横岭到周田村的路我早就会走，他们相信就不多说了。我步行到横岭村，见到景色和许多故旧，就下山了。直到现在，有时还想到这个村庄。当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还在紧张进行中，我想，什么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才能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，同心协力、和和睦睦地进行经济建设呢？

我喜欢孩子，只身到干校后更是如此。周围邻居中随父母一起来走“五七道路”的孩子，大约有一个班，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，其余的都在上初中、小学。他们经常在我身前身后转，央我讲故事，教他们写毛笔字，或看我做木工活。

小家伙们求知欲很强，王伯强的儿子王伊争就是一个。他当时只有八九岁，圆圆的脸庞，大大的眼睛，常向我提一些关于红军时期和长征的问题。我指着地图告诉他，井冈山在哪儿，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又去了哪儿，长征是从哪儿出发的，先后经过哪些省份，走了多长时间，最后到达什么

地方，等等。他听得很用心，也喜欢想问题，样子文静而腼腆，我挺喜欢他的。

他的姐姐王伊力，当时也不过十二三岁，在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初中。“共大”虽名为大学，实际上是中专，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书本知识外，一个共同课目就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牧生产劳动。

孩子们经常上山下田，鞋子穿得很费。那时候，我经常打草鞋，除了自己穿，也送给孩子们和老表。这门手艺当年红军指战员人人都会，我也在行。

有一次我打草鞋，伊力站在旁边看。我看她很想要草鞋，就对她说：“你跟妈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，扯开成七八分宽的布条条，我帮你打双布草鞋。”她很高兴，一会儿从家里拿了些布条来，我就给她打了双草鞋。她舍不得穿，一直保存在箱子里留作纪念。前些年他们父母子女来看我时，伊力还特地把草鞋带来，说：“萧伯伯，您还记得吗？这是在干校时您给我的。”

重睹当年旧物，引起我对干校生活的许多回忆。昔日那个扎小辫的女孩子，转眼工夫已长大成人了。她告诉我说，她在某个单位当会计，弟弟伊争搞电视宣传工作，现在已经是导演了。想想当年那一帮小家伙，有如一株株柔幼的小苗，“文革”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摧残到他们，但也跟着父母受了不少锻炼，甚至磨难。

在邻居们的孩子中，张继璜和王敏芝的小女儿张青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张是江西老表，老红军，他们平常总是关心我，因此对孩子也有影响。云山虽是山区，夏天仍然很热，白天气温经常在摄氏三十多度。为了凉快，我便将长袖衣服剪成短袖，长裤剪成短裤，王敏芝帮我用缝纫机把毛边一轧，看上去就整齐多了。

有一次，我陪张继璜一起到赤石岗中学去接小青回家，走到半路我腿上的旧伤又犯了，他搀着我到几里地外的总场医院挂号、上药，事后又扶我回来。这一切，小青都看在眼里，主动帮我干家务活，还帮我拆洗被子。

她们母女二人上山拾柴时，她主动对妈妈说：“萧伯伯腿上有伤，又

有心脏病，不能让他也上山拾柴。咱们多拾点，分些给他就够烧的了”。我感到这孩子心地善良，特别懂事。她自己从小患小儿麻痹症，腿脚不太方便，还处处关心他人，使我颇受感动。

还有几个当地小青年，如总场革委会主任的女儿，有时也到我这里来玩。有一次，她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起来了，她们都是云山机械厂的工人，请我到她们单位去讲红军故事。

她明知我当时的特殊身份，却并不介意。对我说：“您是江西游击战争时期的老兵，什么审查不审查，那是在北京的事；现在来到江西，老百姓早就审查通过了！”

我有些犹豫，怕连累她们。而她却毫不畏惧，说“我们是工人阶级，工人请您，谁能斗我们工人阶级？”

孩子们的信任，我终于去了。

我不仅和工人、农民、青年、孩子交往，还同知识分子交朋友。到江西的第二年，我膝关节踝关节患瘙痒溃烂症，日夜不宁。一天上午，一位男青年来找我，他说他从中央卫生部的“五七干校”（离周田15华里）来，是医科大学毕业生，名张祖济。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听说我病了，让他来看看我，为我治病。他给我扎梅花针。几天之后，病痛减轻了。钱信忠同志和这位医务人员之所以这样做，完全是出于对一个身处逆境的老同志的同情，令我十分感动。以后，张祖济常来我处，我们交了朋友。我回北京不久，他也回来了。他现在又在河南经商，赚了钱，做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，我赞赏这位知识分子的气节。

到江西后，还有几个不期而至的老人来找我。第一位是当地的一个老表。那时，正是1970年春节刚过。一天早晨，张继璜到山下食堂吃早点，看见一个50多岁的农民，肩背一支鸟铳，手提一只麂子，进门就向食堂服务人员打听：“萧克在哪里？”

继璜见此人来得蹊跷，没有马上搭腔。过了一会儿，食堂有位湖南籍炊事员悄悄对继璜说：“这人就住在附近，一直在找萧克，能不能让他见见？”

继璜了解了一下情况，便把他带到我住处。坐下来一谈，原来是